

● 历史学

20年代魏玛德国与50年代联邦德国 对外政策目标之比较

戢太坤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 100040)

[作者简介] 戢太坤(1974-),男,湖北房县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记者,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摘要] 对外政策目标对于理解对外政策及活动具有重要意义。20年代魏玛德国与50年代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体系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在实质上却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及其原因决定了其对外政策取向,并限定了对外政策的实现程度。

[关键词] 20年代魏玛德国;50年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

[中图分类号] K 51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6-0851-07

一般而言,对外政策是具体国家基于国家利益考量而形成的具有国家统一性的对其它国际社会行为体及其相互关系产生影响的公共政策^①。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采取对外政策及行动,其目的无非是追求最大限度增进和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至于不同政治力量在具体条件下如何认知和判断国家利益,以及如何在相互冲突与磨合中最终形成以国家意志和行为表现出来的对外政策目标与手段,则另当别论。

对外政策及活动必然要受到具体对外政策目标的统帅、支配和约束,是对对外政策目标的阐释、实践和具体化。因而,考察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就必须首先对其对外政策目标有较为准确和全面的认知和把握。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以及相应的国家利益追求的多样性,对外政策目标往往是多个相互联系的具体目标同时并存而不会单一地孤立地存在。国家对其对外政策目标群依据其性质、重要程度及现实性进行整理并作出轻重缓急的安排,就形成了其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对外政策目标体系。较低层次的对外政策目标经常作为较高层次的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出现,而总体目标或称之为核心目标,则具有

某种自为的性质,除了作为谋求国家利益的手段之外,一般还作为其它一系列对外政策目标的目标存在,并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同时,对外政策目标体系又经常处于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之中。

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对于20世纪20年代魏玛德国和50年代联邦德国来说,无疑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优先地位。正如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所言:“外交政策是我们战败民族最为突出和最为重要的问题。”^[1](作者前言)这两个共和国当时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都或多或少与其对外关系对外政策相关联。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施特雷泽曼和阿登纳都分别属于他们各自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之列,而他们的主要贡献又都集中在对外政策领域。

20世纪20年代魏玛德国和50年代联邦德国当时都把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优先方面,这是较为容易理解的。首先,这两个共和国都处于战败国地位,因而都必然要承受战败的义务和影响。魏玛共和国和《凡尔赛和约》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作为战败国,它无法逃避赔偿占领等一系列问题,不得不忍受战胜国的歧视和掠夺,只能密切关注战胜国的举措和反应,并在极其有限的回旋空间中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同样,联邦德国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产物,……它的成功与失败,它的实力不足……不仅是德国人自身努力,更是超越西德边界及其根本改变能力之外的巨大压力的结果^[2](P. ix),这一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也适合于魏玛共和国。实际上,在对外事务中投入主要精力,对这两个共和国来说都是没有自主性的。其次,当时这两个共和国对内对外事务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正如阿登纳所说:“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在德国内政问题上进行的每项活动本身却都包含着某种对外关系。”^[3](第 266—267 页)在联邦德国未完全恢复主权之前,内政问题往往与盟国有事实或法律上的联系。这种情形在魏玛德国时期同样存在。其三,国际社会的逐渐形成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20 年代魏玛德国和 50 年代联邦德国都从战败的废墟中、从独裁的自戕中建立起来,20 年代和 50 年代正分别是这两个共和国重新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德国问题在当时时代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具有重大国际影响,这两个共和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处境中的对外政策目标及其实现是理解当时时代国际关系的关键,因而也是我们分析和比较的焦点所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当时时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也可对对外政策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典型的实证案例。

二

20 年代魏玛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体系比较容易描述,其追求的对外政策目标较为直露和简单,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或内部文件可以参考。科佩尔·S·平森在《德国近现代史》这部优秀的著作中写道:“稳健派和极端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只是方式方法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却是相同的:使屈从于协约国政策的德国变成能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政策的德国,废除凡尔赛条约,修改东部边界,重新获得失去的殖民地,结束协约国的占领,取消赔款,重整军备,即使不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也要再一次恢复为欧洲列强之一的地位。”^[4](第 563 页)这一描述基本上是和恰当的。1925 年 9 月洛迦诺会议召开前夕,施特雷泽曼写给前德国王储一封密信,谈到了他对魏玛德国对外政策目标的总体想法^①:1. 使赔款问题在德国能够承担的情况下加以解决,首先“让那些掐着我们脖子的人松松手”,给德国带来必要的和平与安全,为德国“恢复力量”创造条件。2. “保护国外的德国人”,建立泛德意志的文化联系。3. “修改东部边

界、重新夺回但泽和波兰走廊,以及修改上西里西亚的边界”。这被描绘成魏玛德国对外政策的三大任务。按照施特雷泽曼的想法,对外政策目标还包括“解放我们的土地,撤出占领部队”、“德奥合并”、重新得到海外殖民地及加入国联等等。考虑到施特雷泽曼曾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长期执掌魏玛德国的对外政策,再比照其后来的对外政策实践,可以认为这些设想正是 20 年代魏玛德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基本轮廓。大体上说,20 年代魏玛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体系是:总体目标或者说核心目标有二,即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和恢复大国地位,这两个总体目标密切相关。在总体目标之下又有减少乃至取消赔款、结束协约国军事占领、修改东部边界和德奥合并、平等军备、重新取得原德国殖民地和获得委任统治权、建立泛德意志“文化整体”以及加入国际联盟等次一级目标。

50 年代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体系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譬如欧洲联合对于联邦德国既是一种目标追求,又充当其它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因而很难对其地位作出恰当的估计。不过阿登纳的回忆录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按照阿登纳的说法,联邦德国 1949 年建国之初就达成的“外交政策总计划”包括:“同法国实行和解,统一欧洲,实现重新统一德国和促进自由世界的大国结成伙伴。”^[5](第 321 页)尽管阿登纳只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严肃的学者,在回忆中不免带有主观随意的成分,但他在整个 50 年代一直执掌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这一评论也确实符合了 50 年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体系的大致轮廓。具体来说,50 年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总体目标主要有两个,即恢复主权和重新统一,此外还有欧洲联合和寻求安全。次一级的对外政策目标则有法德和解,取消设备拆除计划,解决鲁尔和萨尔问题,重新武装,加入北约和寻求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的安全保证,国际监督下的全德自由选举,等等。在 50 年代前期,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的重点是恢复主权,后期则是重新统一;欧洲联合和安全目标在两个阶段都存在,但始终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并往往和前两个目标交织在一起^②。

三

正因为 20 年代魏玛德国和 50 年代联邦德国都建立于世界大战和独裁之后,因而在对外政策目标方面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一方面,它们对外政策目标设计的出发点都是战败国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在对外政策目标体系安排上,其重点首先就是

摆脱战败国的阴影,恢复主权,减少赔偿,加入国际组织,获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安全问题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然而,20年代魏玛德国和50年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又有重大差别。首先,从对外政策目标体系来看,魏玛德国的两个总体目标实际上是一个过程。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必然导致大国地位的恢复,而恢复大国地位必然要求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削减赔款和规避裁军就意味着经济更快恢复和保留军事潜力,而这在当时又是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整个20年代,魏玛德国基本上是同步推进这两个目标的。而50年代联邦德国则增加了一个重新统一的目标,且重新统一和恢复主权实际上是无法同步的两个过程。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两难困境:“按照现实的逻辑,只有通过缓和和合作才能克服德国的分裂,因此统一以缓和为前提,但缓和以军事和政治上的均势为前提,而均势又以德国的分裂为前提。”^[6](第5页)因而在50年代初期,关于重新统一与欧洲联合、重新武装的优先次序问题在联邦德国国内引起激烈的政策辩论。按照阿登纳的逻辑,加入西方阵营,西方国家就同联邦德国一起承担了德国重新统一的义务,而西方的团结和强大最终会迫使苏联作出让步,并就重新统一问题进行谈判^[1](第446—447页)。显然,在这里阿登纳低估了苏联的力量和决心。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恢复主权,相应地融入西欧、重新武装、加入北约,这与重新统一实际上是存在矛盾的两个过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代中期和50年代中期,这两个共和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魏玛德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只是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之手段的变化,由对抗转为履行和解,而联邦德国则是对外政策目标重点的变化,当恢复主权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其对外政策目标的重点转为重新统一和安全。

其次,关于恢复主权,两个共和国也有不同,20年代魏玛德国谋求大国地位的扩张性色彩更为浓厚。在裁军方面,魏玛德国阳奉阴违,强烈要求军备平等,一直保持相当的军事潜力以此为“祖国未来的强国地位”打下基础,国防军首领泽克特“通过全面规避和违反条约的作法所建立的,不是一支人数很少的军队,而是一支袖珍大军,它的危险就在于它的潜力”^[7](第326页)。在洛迦诺,施特雷泽曼虽然承认西部边界和莱茵地区现状,并被迫明确放弃以武力为手段改变东部边界,但始终拒绝接受东部边界,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外国对此予以保证。与此相应,魏玛德国对德奥合并和收复原德殖民地一直念念不忘。

加入国联的目的也很明确,对魏玛德国来说,一方面,这是作为大国的一张标签,另一方面又是主张权利的便利的讲坛。而50年代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在性质上只是平等主权,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国际组织国际事务。当然,并不是说它没有发挥大国影响的野心,但这种影响通过自我遏制而严格限定在西欧联合和充当美国的“小伙伴”的框架之内。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也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扩张性目的,而主要是作为恢复主权的手段。甚至1957年提出的“哈尔斯坦主义”,实际上也只是强调了联邦德国在德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这种差别还在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上体现出来。尽管两个共和国在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过程中都选择了渐进方式,但20年代魏玛德国是要“一个战壕一个战壕地把法国赶回去”,因为“全面进攻是行不通的”^[7](第330页);而50年代联邦德国选择“演进的道路”,只是因为不愿选择“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那种吃了败仗的人民会具有的一些执拗而颇不聪明的立场”^[4](第179—180页),显然,这仅是一种权利要求而非扩张要求。

其三,与此密切相联的另一个显著区别是,20年代魏玛德国对外政策目标体系中几乎没有安全问题的考虑,大多数德国人都相信失败只是暂时的,德国必将东山再起,倒是法国胆战心惊地忙于构造自身的安全体系;而对50年代联邦德国来说,安全问题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决非无足轻重,朝鲜危机爆发后,阿登纳紧张地认为“联邦德国的安全问题是居于绝对首要地位的问题”^[3](第399页),并因此设想了一个安全条约计划。它积极响应美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意愿,这不仅为联邦德国争得了主权,而且会在它与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之间建立更为密切和牢固的联系,从而使西方盟国为其安全问题承担责任。由于联邦德国在安全问题上依赖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保护并追随美国,所以在50年代中期出现的东西方暂时缓和迹象令阿登纳十分不安。

其四,与20年代魏玛德国一味追求主权完整相反,50年代联邦德国在某些方面保留了盟国的权力,如驻军问题、柏林问题等,不过巧妙地通过条约使这种权力转化为一种条约权利,从而名义上实现了联邦德国主权完整。这种保留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一,迎合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某些要求,以有利于恢复主权的努力;二,建立与西方盟国的密切联系,从而使之对联邦德国的安全和德国的重新统一承担责任;三,作为德国统一的保证和象征,充当“使德国保持一个整体的最重要的国际法‘紧固器’”^[8](第123页);四,获得经济等方面的好处,推进

西欧联合的进程。

四

为什么同样是战败国,同样处在重建的初期,20 年代魏玛德国和 50 年代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 对外政策目标体系的安排有赖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包括执行对外政策的起点和基础,对当时自身的实力地位的判断,对国际环境的评价,以及国内政治势力和舆论的影响等等。在这些方面,20 年代魏玛德国和 50 年代联邦德国之间存在着十分不同的情形。

其一,虽然两个国家执行对外政策的起点和基础都是战败国,但又有所不同。魏玛德国是紧接着德意志帝国崩溃之后建立起来的,马上又被迫以德意志帝国的继承者身份接受凡尔赛和约的安排和承担战败国的责任。凡尔赛体系的安排对年轻的魏玛德国来说的确有失公允。在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上,民族自治、普遍裁军、委任统治的理想主义设想成为现实政治妥协的牺牲品。德国失去了约 13% 的领土,10% 的人口,全部的海外殖民地以及大量耕地和矿产资源,并要负担数额巨大的赔偿义务。不仅如此,战胜国还公然歧视和嘲弄战败国,视之为“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普恩加来语)^[9](第 105 页),这就大大刺伤了德国的民族感情。这种对战败国的安排激起了一向自大的德国人的敌视和反抗,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 20 年代魏玛德国近乎疯狂的摆脱凡尔赛束缚的要求。而联邦德国建立距二战结束已有 4 年多,经过分区占领,完全丧失主权,联邦德国的建立及其活动范围完全是西方盟国利益和态度的结果,人们甚至以感激的心情来看待联邦德国的成立,因而在执行对外政策时表现得较为谨慎和现实。

其二,20 年代魏玛德国虽然在领土、人口、资源等方面受到巨大损失,但仍保持着成为最强大的欧洲大国的工业生产潜力和国家统一,仍拥有超过 46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 6 000 万以上的人口,这成为其重振大国地位的物质基础。与此相应,德国人对自身实力地位的判断是较为乐观的,他们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某些偶然因素,认为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理所当然,这一点对于解释魏玛德国对外政策目标的扩张性是很重要的。在战争和殖民地仍为合法的年代,魏玛德国的大国理想也必然浸润着扩张的念头。50 年代联邦德国虽然在经济上仍是一个强国,早在 1950 年生产已达到战前水平,但是二战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而且联邦德国建立伊始就面临

着德国的分裂:东部的农产区为苏联占领,萨尔被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鲁尔实行国际管制,对外事务由盟国掌握,“对战败和被占领的直接反应,是普遍认为德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作用已经终结了。”只是“在俄国同西方的冷战表面化之后,这种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对许多人说来,德国作为一个欧洲主要强国的前景再一次变得既现实,又值得想望了”^[4](第 734—735 页)。事实上,50 年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一直通过自我遏制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其三,两个共和国对国际环境的评价也存在显著的差异。20 年代主要大国除了法国表现出对德国重新崛起深深忧虑,要求严格执行凡尔赛条约之外,其它强国大都对条约加诸魏玛德国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同情和不满。英国几乎一开始就不满凡尔赛条约的安排,尤其博纳·劳时期和斯坦利·鲍尔温时期,对魏玛德国的同情达到了高潮。美国政府、新闻界及公众舆论公开对魏玛德国表示同情,美国商人积极对德援助和投资。列宁一开始就称凡尔赛条约是“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而拒绝承认^[10](第 291—292 页)。这些反应都被魏玛德国视为摆脱凡尔赛体系束缚的鼓励与支持。50 年代联邦德国对国际环境的评价则是非常实际的,充分考虑到法国的安全要求,“试图通过让步事先取得有利地位”^[3](第 293 页)。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由于与美国的先天联系,自然视美国为欧洲和联邦德国的最终保证。这样联邦德国追求法德和解和欧洲联合,甘当美国的“小伙伴”的对外政策就较容易理解。

其四,国内舆论和政治势力也对对外政策目标的达成具有重大影响。20 年代魏玛德国时期,战胜国偏重于对战败国进行经济掠夺,而未对之进行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改造。魏玛德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非常强大,原来的军官阶层被保留下来,战犯也没有得到严厉惩治,各种极端组织包括纳粹组织活动猖獗,民族主义宣传和煽动喧嚣尘上,诸如“背后一刀”的神话广为流传,兴登堡之流成了民族英雄,后来还当选为总统,任何对协约国的让步都被指责为卖国和对德国利益的背叛,恐怖事件屡屡上演。此外,分离主义势力很强大,国内政局极不稳定。因此通过扩张性对外政策转移国内视线成为危险但颇有吸引力的政策选择。相比之下,二战后盟国采取的对战犯的审判、非纳粹化运动以及对德国人实行“再教育”等措施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联邦德国建立之后,阿登纳仍对“自杀性的民族绝对主义”保持警惕。在整个 50 年代,联邦德国的政局相当稳定,这些

使其对外政策目标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

五

总体上看,20年代魏玛德国几乎实现了除重新攫取殖民地和获得委任统治权之外的几乎所有对外政策目标。凡尔赛条约的约束力从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审判战犯和裁军都未得到严格执行,魏玛德国实际上一直保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在赔款问题上也一再获得让步,1929年杨格计划和1932年洛桑会议之后更是不了了之;在洛迦诺会议上,施特雷泽曼成功地使东部边界处于不稳定状态;撤军问题在海牙会议上得到解决;到20年代后期魏玛德国在政治经济上都无疑已成为欧洲大国。50年代联邦德国则基本上实现了与西方各国有关的对外政策目标,如恢复主权,获得平等国际地位,欧洲联合,安全保证,取消设备拆除计划,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解决鲁尔和萨尔问题,等等。而与苏联东欧有关的对外政策目标则基本未获实现,特别是重新统一问题。由于联邦德国推行追随西方的对外政策安排,实际上为重新统一设置了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通过全德自由选举建立联邦制国家,后来又加上国际监督的内容,实质是联邦德国统一东占区,二是统一后的德国加入西方阵营,这就超过了苏联所能作出让步的底线。1955年德国条约生效,联邦德国恢复了主权,随后加入北约,苏联阻止联邦德国加入西方阵营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然而东西方力量平衡并未如想象中那样因此而发生显著改变。1955年6月苏联建议与联邦德国就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邀请阿登纳访问莫斯科,阿登纳为此洋洋自得地声称“这一倡议证明了联邦政府历来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1](第527页),而实际上苏联此举表明它已接受了两个德国并存现状,此后关于中欧中立地带的设想不再以德国统一为前提,而是以两个德国并存为基础。当联邦德国认识到“分割德国不是原因,而是在分割之前早已存在的美苏之间紧张局势的结果”^[5](第549页),“解决德国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手里。”无论如何已为时过晚。三组相互联系的因素对这两个共和国对外政策目标选择及其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④。首先,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要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一战后是一种多极格局,各国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追求不同的对外政策目标,必然会产生各种分歧和矛盾,并形成国际力量的多种组合选择。20年代魏玛德国正是利用了战胜国之间的矛盾,采取纵横捭阖的手段,一方面依靠英美对抗法国的霸权和掠夺,一方面与苏联(俄)建立某种联合以在东

西方寻求平衡,在初期全面对抗的政策失败后,转而采取德法和解的姿态,从而为一个战败国争取到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而二战后短暂的多元体制迅速演变成两极冷战格局,尽管西方各大国之间也有分歧和矛盾,而最终都不得不服从美国的全球战略意图。在这种两极格局中,鉴于联邦德国的国家实力、地理位置、历史处境等的特殊性,只能在两极之中选择一极,而不能在两极之间荡秋千。联邦德国死心塌地地追随美国和西方,极力反对苏联,并不是它不想有多种选择并利用苏联在西方捞取好处,真正“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既然被纳入冷战轨道和绑上美国战车,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联邦德国只能服从美国的战略安排,并使任何偏离既定轨道的得不偿失的冒险成为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阿登纳反对任何中立的设想,最后寻求东西方的缓和,以此推进德国重新统一,确实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高度政治敏感和智慧^⑤。

国际格局影响着各国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这是影响对外政策目标实现的第二个因素。实际上,一个国家推行对外政策,首先就要与其他具体国家打交道,都要对具体国家产生影响,因而具体国家的实力、态度、以及利益判断和追求,各国之间的关系状况,就成为必须予以考虑的现实制约因素。一战后美国虽然是实力最强的国家,但采取孤立主义的态度;法国仍是一个欧洲大国,极力追求自身的安全,英国虽也衰落了,但毕竟死而未僵,念念不忘欧洲均势,这两个活跃的大国勾心斗角,对欧洲和世界都具有重大影响;苏联(俄)就其影响来说也是一个大国,但处于孤立和被封锁的境地,迫切需要摆脱困境。这样多个无从属关系的国际力量的各自对外政策目标及其相互关系,是魏玛德国对外政策目标实现的极其重要的背景和条件。而二战后只剩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它们为争夺全球战略利益展开旷日持久的“冷战”,欧洲中心的时代一去不返,英法已沦为二等强国,欧洲成为“冷战”对峙的前沿阵地,在这种条件下,联邦德国只能“绝对真诚”地追随美国和西方,通过欧洲联合来逐步恢复主权和发挥大国的影响。其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意图和实力。

这种宏观的国际和历史条件不仅影响对外政策目标的达成,同样制约其对外政策手段的选择。另一方面,对于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手段的选择又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延滞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20年代魏玛德国对国际环境的判断是,国际社会列强并存,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矛盾,苏联(俄)与西

方之间存在紧张的冲突,因而要“要手腕和避免作出决定”,注意在东西方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而不是作出“选择”。50年代联邦德国对国际环境的基本判断则是国际社会只存在美苏“两个大国”,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冷战,世界简化为东西两大阵营,而联邦德国处于双方争夺的前沿,因而必须作出选择,而更合适的选择当然是美国而非苏联。应该说,这两个共和国对外政策手段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并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后来又都走向了极端,魏玛德国走上了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而联邦德国也未能充分理解5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冷战缓和趋势。

20年代魏玛德国和50年代联邦德国所处的地位和环境都相当特殊,这种地位和环境的典型性使得对外政策对这两个共和国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也给我们的比较分析提供了相对简明而独特的对象。我们看到,这两个共和国当时时代对外政策目标体系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也有很大的差异,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更有显著的不同,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因时因地因对象而大不一样,而且虽然在当时时代两个共和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似乎都获得了比较成功的实现,然而它们以后所走的道路又如此不同,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般而言,对外政策目标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从本国实际地位和处境出发而对来自国际国内的挑战所作出的能动回应,对挑战的判断之于对外政策目标的达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外政策目标实现要受到国际力量的格局、态度及其行动的影响和国内某些因素的制约,并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实际上,对外政策目标及其实现是追求与现实之间的对话,现实为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并使目标不断调整和修正以适应现实的条件;另一方面,目标追求又积极谋求影响和改变现实,使之朝着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高明的对外政策手段会有益于这一过程。对外政策目标性质的差别会对国际社会国际关系发生不同作用。虽然20年代魏玛德国形式上实现了几乎全部对外政策目标,而50年代联邦德国却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这两个共和国以后的发展道路又如此截然不同。历史地看,20年代魏玛德国过于顺利地实现了带有极端利己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目标,确实为希特勒疯狂的法西斯主义准备了国内和国际条件,甚至可以说,前者正是后者的起点,这实非历史的幸运。而50年代联邦德国在追求对外政策目标时则较多考虑了国际利益、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在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上并未陷入极端利己主义的泥

淖。应该说,二战后长时期的和平局面也有联邦德国的一份贡献。在当今日益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各国利益更加紧密地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各国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时如何充分考虑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并努力寻求适当的平衡,更有其特别的重要性。

注 释:

- ① 本文使用“对外政策”概念而不使用“外交政策”,是因为前者外延更广。关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还可参见:佐滕英夫著,王晓滨译:《对外政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 ② 参见:科佩尔·S·平森著,范德一等译:《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74—575页;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著,汪绍麟等译:《外交史(1919—1984年)》(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康拉德·阿登纳著:《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31页。
- ③ 上述50年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体系主要是由阿登纳四卷回忆录归纳评估得出,限于篇幅,兹不详述。此外还可参见:陈乐民著:《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277页。
- ④ 当然,对外政策目标是在与其它国际社会行为体的互动关系中实现的,特别是苏联(俄)对20年代魏玛共和国和50年代联邦德国都具有重要影响,对于这两个共和国具体对外关系的演变及这种关系如何对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发生作用,兹不详述。
- ⑤ 如果德国在中立的基础上实现重新统一,首先就必须面临政治、经济、安全上中立如何可能的问题,无论德国武装中立或建立中欧中立地带的设想都无法对此作出回答。

[参 考 文 献]

- [1]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3—1955)[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 [2] HANRIEDER. Wolfram F. Germany, America, Europe: For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 [4]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M].范德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5]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9)[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 [6] 周琪,王国明.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1945年—1980年)[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 [7] [英]C·L·莫瓦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十二

- 卷);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1898—194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8] [德]威廉·格雷韦.西德外交风云纪实[M].梅兆荣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 [9] 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 [10] [苏]列宁.列宁全集:第 3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责任编辑 张 琳)

Foreign Policy Goals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1920s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in 1950s: Comparison

JI Tai-kun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Beijing 100040, China)

Biography: JI Tai-kun(1974-), male, journalist,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majoring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ie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foreign policies as well as foreign policy activities. The systems of foreign policy goals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1920s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in 1950s are summarily compared.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nature between the foreign policy goals of the two Republics define the orientations of foreign policies of them, and thus the levels of realizing foreign policy goals.

Key words: the Weimar Republic in 1920s; the Federal Republic in 1950s; foreign policy goals